

# 毛泽东关注新民歌

○刘延年 晁爱丽

在1958年“大跃进”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它在文化领域“大跃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新民歌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陕甘宁边区的《王贵与李香香》等带有浓郁陕北民歌色彩的作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对民歌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给予民歌以特殊的关注。

民歌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到格外的重视，这与上个世纪关于新诗发展的道路问题紧密相关。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曾就中国新诗的发展问题进行过讨论。一些著名学者如蔡元培、胡适、刘半农、俞平伯等人就主张诗歌在本质上是平民的，要回到民间去，汲取营养，从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俞平伯在其著名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说：艺术本来是平民的，新诗不但材料须探取平民的生活，民间的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好。为实现诗歌的平民化，使诗歌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上，俞平伯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的改造，使社会安稳地建设在民众的基础之上；二是文学的改造，新诗从材料和风格上都应该平民化的才好。随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了《歌谣周

刊》，许多文化名人都曾参与民间歌谣的采集。在他们看来，民间歌谣的搜集，不但可以为民俗研究提供新鲜活泼的材料，而且还可以为新诗的发展提供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来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北京大学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和民歌收集活动显然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诗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新民歌运动时，还多次提到北京大学的民歌采集活动。

毛泽东很早就重视民歌的作用——把民歌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

山休养。其间，他组织农民运动、办夜校，并开始用当地的民歌、民谣编写识字课本。1926年，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作为负责人的毛泽东主持拟定了租率、田赋、农民观念等36个项目，引导学员到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其中就有收集民歌这一项内容。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进行调查活动时又搜集了一些民歌，并把它们写进自己的报告里。

早年的民歌搜集活动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会议上一往情深地回忆说：“有几个典型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过去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搜集的几千首民



1963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与人民群众在一起。

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和生动、新鲜的语言，丰富自己的创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说，乡间的农民不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即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不用典、不重对偶等等），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却很丰富，言辞也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仅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是很好的诗人。他指出，民歌中也有许多很好的诗。从1938年到1942年初春，延安兴起了一个诗歌运动。一些诗人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大众化风格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特别是萧三、丁玲等到延安后，街头诗更加兴旺，可以说是“满街诗花，满墙诗花”。

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文艺要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要和革命的群众相结合，要面向工农兵，要做到使劳动人民喜闻乐见，要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再次号召作家放下架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创作出为他们所喜爱的作品。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许多作家、诗人开始走到群众中去，如著名诗人艾青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学习和“采风”，收集了很多的民歌和剪纸，一改过去忧郁、深沉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些具有民歌色彩的作品。1943年10月，延安诗界举办诗歌大众化座谈会，提出“由创作‘失众化’的诗，到思想感情都倾向于工农兵的‘失众的诗’”的主张。许多作家都学习采用民歌体写诗，力求使自己的诗做到通俗易懂，为群众所喜爱。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竟章的《漳河水》等作品，在这些带有浓郁陕北民歌色彩的长篇诗体里，人民群众第一次成为艺术所描写和反映的主人。这些作品赢得了边区人民的喜爱，也给毛泽东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常常以此来印证这一诗歌发展方向的正确性。

建国初期，围绕着新诗发展的问题，中国作协曾于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三次诗歌形式座谈会。《光明日报》又于1956年下半年对五四运动以来新诗的评价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这些讨论，显然引起了对新诗发展颇为关注的毛泽东的注意。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诗人袁水拍和臧克家，就文艺界关于新诗的讨论和新诗的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毛泽东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号召大家搜集和创作新民歌。他说：“印了一些诗，尽是些老古董（指他在成都亲自编选的一本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和一本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这样会搜集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第三个新东西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

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如在4月初武汉会议期间他又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几次谈话，毛泽东对新诗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旧体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虽然已经很成熟了，但它太束缚人，为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毛泽东甚至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旧作；而新诗在他看来，几十年来迄无成功。那么，新诗的发展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呢？他选择了在民歌和古典两者结合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新的东西：既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汲取民歌中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又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而内容和风格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就是毛泽东理想中的新诗，也就是新民歌。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主体，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主体。但是在旧社会，人民群众创造的权利被剥夺了，只有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民歌中才存在着他们的声音，表达着他们的理想和感情。在新社会，他们当然也应该是文化特别是诗歌创造的主人和主体。如果说在延安时期，开始了作家与人民群众的结合，那么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就要真正作为主人和主体走到文艺创作的前台来了。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社论指出：“从已经收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民歌来看，这些群众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的气魄。”社论还号

召：“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此前的4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立即组织收集民歌》的通知，通知中不具名地引用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关于搜集和创作民歌的讲话。

其实，早在1957年冬季兴修农田水利运动中，即出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兴修水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新面貌的民歌。当时许多地方为动员群众，将政治口号和生产口号歌谣化，以鼓舞群众生产劳动的热情。如四川叙永县提出：“山顶戴帽子，山腰缠带子，山脚穿鞋子，山底钉钉子。”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于1958年初即编辑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那首《我来了》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县党委部门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的组织和编选的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新民歌运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周扬说：“民歌成为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周扬还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

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周扬在发言中还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且让人编选了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的附件印发给与会代表。

周扬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作第三次发言时说：“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汇总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种报刊上的民歌作品给他。

我们可以从当时报纸的介绍中看到当时新民歌运动发展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决定三到五年内要生产50万吨钢，搜集50万首民歌，把搜集民歌和生产钢铁并列在一起，内蒙古全区要在5年内搜集1000万首民歌；安徽省巢县司集乡从生产“大跃进”以来，已创作了12万首民歌，到年底还要再创作60万首民歌；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篇群众创作的运动，结果被保定的一个地区全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内生产30万个“李有才”和30万个“郭兰英”；四川省对141个县市进行统计，截至到10月份，这些县市就编印了3733种民歌小册子。“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诗人千



在1958年文化“大跃进”中，提倡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许多地区组织赛诗会歌颂“大跃进”。图为西安市灞桥区白庙农业社的社员在赛诗会上朗诵自编的诗。

千万，李杜也寻常”，“要问名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

### 在新民歌运动开始一年后，毛泽东就批判了遍地放诗歌“卫星”、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现象

各地的新民歌创作是丰富多彩的。从形式上讲：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田头赛诗会、战擂台、诗街会、诗人之家、父子赛诗台、母女赛诗台、夫妻赛诗台等。在一些地方的墙上、门上、山岩上、跃进坊上、树上、电线杆上、商店柜台上、酒桶上、磨盘上，到处都是诗和画。四川省叙永山区有一个七口之家，除了一个失明的老母和两个二三岁的孩子外，全都写诗，1958年10月以前，一家就写诗3500多首。安徽“诗歌之乡”巢县司集乡，就创造了“迎风挂牌”、“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即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做什么事情就编什么。从内容来看：有歌颂党和领袖，歌颂兴修水利、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大炼钢铁、总路线、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技术革命、移风易俗等，反映了从兴修水利开始的“大

跃进”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即使是出门旅行的人们，也要加入新民歌创作的大潮。1958年11月，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乘务员作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从3月到10月，上海列车段的旅客意见簿上，旅客们写下的诗歌就有5300多首。1960年，一位作家由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还被列车员邀请参加赛诗会。乘务人员还规定每位赛诗会成员下车前必须至少写出一首诗。

我们可以从1959年郭沫若、周扬主持编辑出版的《红旗歌谣》中看到新民歌作品之一斑：

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高不过蓝天大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幸福的大路共产党开，青松翠柏我们栽。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须半杆烟。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在“大跃进”中，《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中的几首诗，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说它们“很有意思，是一首诗”。其中一首是：

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在新民歌运动中，王老九、刘章、黄孝声、殷光兰、姜秀珍等一批民间歌手特别引人注目，除王老九是延安时期开始创作的农民诗人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在新民歌运动

中涌现出来的新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创作生命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刘章、姜秀珍等。

文艺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创作的洪流中去。文坛泰斗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他满怀豪情地预言：“中国的新国风，将来恐怕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这同时是文艺生产上的‘大跃进’。”接着，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诗人贺敬之也热情地预言，“‘大跃进’民歌的出现，及它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

著名诗人田汉有一组民歌体的《钢铁颂》，其中有写音乐学院师生炼钢的一首，别有风格，一时间广为流传：

读书生产两无双，不再苍颜恋书窗。中国正多新榜样，炼钢炉前学肖邦。

虽然这首诗写于“大跃进”时期，但更接近于传统竹枝词的风格。这可能是整个大炼钢铁时期最具有诗意的作品。

195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其中一首写道：“别看作者小，诗歌可不少。一心超过杜甫诗，快马加鞭赶郭老。”

郭沫若写了一首诗答作者：

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新民歌运动还开展到劳动改造的农场里。1957年，著名作家聂绀弩因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遣住北大荒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记录了当时“队员”们写诗的情况：“1959年某月，我在北大荒八五〇农场第五队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

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他还用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做诗的情景：

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波折，新民歌运动也退潮了。毛泽东对新民歌的态度也渐渐地平静和冷静下来。在新民歌运动开始一年后，毛泽东就批评了遍地放诗歌“卫星”、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现象；对周扬等人编的《红旗歌谣》也表示了不满，认为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毛泽东曾谨慎地对臧克家谈起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看法：“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他曾在1959年3月份的中央政治局郑州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

“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他自己的书桌上摆着的仍然是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古代诗人的集子。个人丰富成功的创作经验和高度的艺术趣味使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对新民歌运动的推动和支持。但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依然关注甚深，对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在毛泽东1965年给陈毅的信中，他再次谈了自己对新诗发展问题的看法：“白话写诗，八十年来，迄无成功。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还对陈毅说，“你还可以写新诗”，“你会写自由诗”。毛泽东自己也写下了颇具民歌色彩的杂言体诗《八连颂》。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已无心顾及中国新诗的发展了。■